

# 列宁全集

# 列 宁 全 集

第二版增订版

## 第三十二卷

1917年7—10月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项目统筹：崔继新

责任编辑：崔继新

装帧设计：石笑梦

版式设计：周方亚

责任校对：吕 勇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列宁全集·第32卷/(苏)列宁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2版(增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

ISBN 978-7-01-017120-3

I.①列… II.①列… ②中… III.①列宁著作·全集 IV.①A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6441 号

---

书 名 列宁全集

LIENING QUANJI

第三十二卷

编 译 者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出版发行 人民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邮编 100706)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2 版增订版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8.875

插 页 4

ISBN 978-7-01-017120-3

字 数 491 千字



印 数 0,001—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01-017120-3

定 价 47.00 元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 凡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 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 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4. 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5. 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6. 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7. 《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 〕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 前　　言

本卷收载列宁在1917年7月10日(23日)至10月24日(11月6日)期间的著作。

在此期间,俄国的政治形势复杂多变,阶级斗争异常激烈。七月事变是形势急剧变化的转折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凶残地镇压7月4日(17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和平游行示威的工人和士兵,诽谤并迫害布尔什维克党,下令逮捕列宁。一句话,政权完全转到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手中,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至此终结了。

七月事变后,列宁按照党中央的安排,开始隐居离彼得格勒不远的拉兹里夫湖畔,不久移居芬兰。10月7日(20日)又秘密回到彼得格勒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从本卷所收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列宁在这三个月秘密活动期间如何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及时为无产阶级制定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的斗争方针和策略,指引布尔什维克党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列宁在7月间写的《政治形势》、《论口号》、《波拿巴主义的开始》和《革命的教训》等文章中,回顾二月革命以来阶级斗争的特点和经验教训,深刻分析了七月事变以后的新形势,制定了布尔什维克的新策略。列宁在《政治形势》一文中指出:立宪民主党、军人集团和黑帮君主派这三股主要的反革命势力已经完全组织起来和巩

固起来，并且实际上取得了国家政权；现在俄国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是军事专政；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领袖们彻底出卖了革命事业，他们操纵的苏维埃变成了反革命的遮羞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已经不正确了，因为它没有考虑到目前发生的这种转变，没有考虑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革命的彻底背叛。他认为，只有发扬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坚韧不拔精神，准备力量举行武装起义才是出路。但目前武装起义还有困难，“要聚集力量，重新组织力量，并在危机的进程允许进行真正群众性的全民的武装起义的时候坚决地准备武装起义”（见本卷第5页）。现在也应当像在1912—1914年那样把合法活动和秘密活动结合起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了《政治形势》一文，该文为布尔什维克党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制定新的斗争策略提供了指导思想。列宁在《论口号》一文中指出：每一个口号都应当以一定政治形势的全部特点为依据，“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在七月事变以前是正确的，因为那时的“苏维埃是由广大自由的即不受任何外力强制的、武装的工人和士兵的代表组成的。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强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开辟并保障了整个革命和平向前发展的道路”（见本卷第6—7页）。现在革命的和平发展已经毫无可能，因此必须撤销这个口号，否则这个口号客观上就会欺骗人民，使人民对屈从于资产阶级的苏维埃产生错觉，似乎现在只要苏维埃愿意取得政权，它就可以取得政权。他同时指出，撤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并不等于放弃苏维埃这一新型的国家形式。“在这新的革命中可能而且一定会出现苏维埃，但不是现在的苏维埃，不是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机关，而是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机

关。到那时候，我们也会主张按照苏维埃类型来组织整个国家，这是必然的。”（见本卷第 12 页）

本卷中的许多文献是为揭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争取群众而写的。《感谢李沃夫公爵》、《答复》、《政治讹诈》、《论诽谤者》等文章驳斥了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党的诋毁中伤，揭穿了他们卑劣的政治讹诈手段。《论立宪幻想》一文用政府一再拖延召开立宪会议和一手制造七月事变的事实，说明国家政权实际上已经转到反革命手中。列宁揭穿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散布的立宪幻想。他说：“如果俄国不发生一次新的革命，如果不推翻反革命资产阶级（首先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政权，如果人民仍然信任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这两个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党，立宪会议要么永远开不成，要么会变成‘法兰克福清谈馆’，变成软弱无力毫无用处的小资产者的会议。”（见本卷第 21 页）在《政论家札记（农民和工人）》和《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又一次欺骗》两篇文章中，列宁着重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工农联盟政策，揭露了社会革命党人对农民的欺骗和背叛。

8月25日发生了科尔尼洛夫叛乱。沙皇的将军、军队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在立宪民主党的支持下，把“野蛮师”和哥萨克调往彼得格勒，企图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建立军人专政，复辟君主制度。列宁在8月30日（9月12日）《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指出：科尔尼洛夫叛乱是出乎意料的急剧转变，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审慎地修改和变更策略；我们同克伦斯基的军队一样，要同科尔尼洛夫作战，但是，我们不支持克伦斯基政府，决不放弃推翻克伦斯基的任务；现在要用另一种方法同他斗争，要揭露其软弱和动摇。列宁强调应当发动群众并带领群众去同科尔尼洛夫进行

斗争，并指出：“如果认为我们离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更远了，那是不对的。不，我们是大大接近这个任务了，不过不是正面接近，而是从侧面接近。”（见本卷第 117 页）

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和组织工人农民和士兵平息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布尔什维克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迅速提高，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许多地方的苏维埃都先后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此时又出现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再度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列宁在 9 月上旬写的一些文章反复阐明了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可能和必要。他在《论妥协》一文中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可以向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政治上作某些让步以达成协议的问题，并论述了马克思政党对待妥协的原则：“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不可能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如果妥协不可避免）始终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见本卷第 130 页）他指出，只是由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奇特的转变，只是为了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可能（这种可能性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我们才向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建议妥协，就当前来说，就是恢复七月事变前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成立没有资产阶级参加的、对苏维埃负责的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成的政府。布尔什维克不要求参加政府，不立刻要求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然而要有鼓动的充分自由，以便在苏维埃中扩大自己的影响。

在稍后一些日子写的《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俄国革命和国

内战争》、《革命的任务》等文章中，列宁继续论述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的问题。他指出，现在俄国没有一个阶级敢于掀起反对苏维埃的暴动，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如果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现在还能够（看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的斗争，保证通过实践来考验各政党的纲领，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见本卷第157页）列宁认为，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必然发生国内战争，这次战争的结局一定是工人阶级在贫苦农民的支持下取得彻底的胜利。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领袖们拒绝布尔什维克关于妥协的建议，他们在联合“国内一切活跃力量”的口号下，支持资产阶级组成以克伦斯基为首的所谓执政内阁，并准备草草召开民主会议，组成所谓预备议会。短暂出现的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消失了，武装起义势在必行。

9月中旬列宁在给党组织的两封信《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中，对国内形势作了全面剖析，指出当时布尔什维克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之后，可以而且应当夺取国家政权；布尔什维克不必等待“形式上的”大多数，“如果我们现在不夺取政权，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见本卷第234页）。列宁还在《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一文中结合当时俄国的实际阐述了必须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指出：“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是靠一个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

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见本卷第 235—236 页)。

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阐述了俄国无产阶级要建立的国家的基本政策、经济纲领。他详细论证了克服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的办法：工人对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取消商业秘密、没收地主土地和全部土地国有化等。这些措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然而它们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列宁还阐明了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他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战争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级。”(见本卷第 218—219 页)列宁认为，俄国的垄断资本主义也在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俄国，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就不能前进。

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中驳斥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散布的所谓布尔什维克永远不敢单独夺取政权、即使夺取了政权也无法保持的论调。列宁论证了俄国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和政治前提，指出布尔什维克不仅准备夺取政权，而且能够依靠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保持政权，组织新社会的建设。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指出：工人阶级必须摧毁地主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建立起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构——苏维埃；至于那些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机构，如银行、铁路、

邮政、辛迪加等等，则不可能打碎，也用不着打碎，应当使它们摆脱资本主义的影响，成为更巨大、更民主的机构。列宁还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必须最广泛地吸收劳动群众参加国家管理。

《论修改党纲》一文是针对修改党纲的不同草案和意见而写的。列宁详细分析了索柯里尼柯夫草案，着重批评了他在帝国主义问题表述上的理论错误，指出他没有对当前这场战争作出评价，他把危机和战争相提并论是错误的，危机和战争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现象，有着不同的历史起源和不同的阶级意义。列宁还批评了布哈林和斯米尔诺夫提出的关于取消最低纲领这一貌似十分激进而其实完全错误的建议。他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夺得政权，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我们应当坚定地向这一目标前进，但我们现在还生活在资产阶级制度的框子里，我们还没有砸烂这个框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还没有实现，敌人还没有打垮，因此现在提出抛弃最低纲领是可笑的。“我们是勇敢地进行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同时冷静考虑事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没有权利抛弃最低纲领。”

(见本卷第 366 页)

在本卷收载的《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政论家札记(我们党的错误)》、《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 10 月 8 日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决议草案和给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书的提纲》等文章中，列宁批评了布尔什维克党参加民主会议的错误策略，指出在革命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下参加旨在欺骗人民的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就等于助长这种欺骗，增加革命准备工作的困难，分散人民的注意力和党的力量，忽视推翻临时政府的斗争这一迫切任务。他主张退出会议，把党的一切优秀力量都派到工厂和兵营去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遵照列宁的指示，党中央纠正了加米涅夫

等人关于应当参加预备议会的错误主张,于 10 月 5 日(18 日)通过了关于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的决议。

在 9 月 29 日(10 月 12 日)写的《危机成熟了》一文和 10 月 1 日(14 日)《给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莫斯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信》中,列宁坚决反对党内有些人提出的等到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时举行起义的建议。他强调指出:“危机成熟了。俄国革命的整个前途已处在决定关头。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荣誉正在受到考验。争取社会主义的国际工人革命的整个前途都在此一举。”(见本卷第 275 页)

列宁在 10 月 8 日(21 日)即回到彼得格勒的第二天写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中,再次呼吁迅速而坚决地组织起义,夺取政权。他反复强调:拖延等于自取灭亡。他在同一天写了《局外人的意见》一文,送交彼得格勒党组织。他在文中对武装起义作了具体部署,并具体介绍了马克思关于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的论述,号召党的领导一定要牢记马克思的遗训组织好武装起义。

本卷还收入列宁在 1917 年 10 月 10 日(23 日)和 16 日(29 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发言记录,以及他起草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列宁在会议上论证了武装起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断定大多数人都拥护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问题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号召工人和士兵全面加紧准备武装起义的决议。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中央委员会的这两次会议上坚持起义为时尚早、起义必然失败的错误观点,反对中央委员会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列宁在 10 月 17 日《给同志们的信》中逐条驳斥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

武装起义的理由,指出他们的“理由毫无力量,鲜明地反映出他们张皇失措、惊恐万状,布尔什维主义和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在他们身上已丧失殆尽”(见本卷第390页)。

10月18日(31日)加米涅夫以自己的名义并代表季诺维也夫在半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发表题为《尤·加米涅夫谈“发起行动”》一文,不同意中央委员会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泄露了党中央关于决定起义的秘密。列宁在10月18日《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和10月19日《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对他们在非党报纸上抨击党中央没有公布的武装起义的决定极为愤慨,认为这是“前所未闻的工贼行为”、“卑鄙的叛变活动”,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列宁在10月22日或23日给斯维尔德洛夫的信中仍在关注中央委员会对他们的处理意见。

编在本卷正文最末一篇的列宁10月24日(11月6日)晚间写给中央委员的信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列宁在信中发出了立即举行起义、夺取政权的号令。他指出: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绝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各族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夜里逮捕政府成员,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历史不会饶恕那些拖延时日的革命者;拖延发动等于自取灭亡。当夜,列宁来到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震撼世界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在《列宁全集》第2版中,本卷文献比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7篇:《就印发〈关于里加沦陷的传单〉所写的一封信》、《“地主同立宪民主党人串通一气了”》、《给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信》以及《附录》中的全部文献。在本卷收载的《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

议 10 月 8 日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决议草案和给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书的提纲》中,增补了全集第 1 版未收入的《关于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及其《附注》。



弗·伊·列宁  
(1917年)